

佛光下的沉思

隋唐哲学

•牟正纯 著

辽海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 ⑩

李治亭

苗壮 主编

李家巍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

佛光下的沉思

——隋唐哲学

车正纯 著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李治亭 苗 壮 李家巍

副主编：王升元 王海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申 王升元 王海明

王朝增 丛曙光 刘英奎

李治亭 李家巍 苗 壮

郭信聚 韩锡铎

前　　言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是我们为全国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撰写的一套综合性的知识读物。出版之际，我们愿把一些想法直接告诉热心的读者。

这套《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推出30册，它包括了文学、历史、哲学、法律、艺术、民俗几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几个方面分别涵盖在文、史、哲这三门学科之内。从广义上说，它们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总量中，社会科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社会科学中，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不能不居于首要地位。文学是以形象思维描写人，历史是以科学的逻辑思维研究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的演变，哲学则是研究人的思维方式、方法，即人的世界观。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体现出不同的思维范畴与研究手段。但它们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或描写。人是社会的主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艺术等等，都是靠人的主观活动及操作而存在，而发展。即使如当今一切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无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每个时代，如没有一批具有高度

文化素养的人，就不会有重大的发明创造。可见，从个人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文化素养的高低，不能不决定一代社会发展的水平。换言之，一个民族或国家，其社会科学发达的程度，必然制约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都是在封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出现的，即是明证。如果说，一切的自然科学是在探索大自然及整个宇宙的秘密，进而改造自然及整个宇宙的秘密，进而改造自然，为人类谋取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那么，社会科学就是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及社会变革的规律，用以改造人类自身，造就成高度文明和高度素养的人，进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显然，在人类的所有科学中，社会科学理所当然地居于首位，是起领导作用的科学。而文史哲是社会科学的精髓、核心。

我国著名的哲学史专家、佛学家任继愈先生深刻地阐明文史哲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他说：“文史哲这几门学科，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却代表着民族的性格，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史哲是民族灵魂所在，一定不能忽视。在我看来，忽视文史哲的民族是最贫困的民族。”我还想补充一句：也是最愚昧的民族。这是一代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学术探讨，才得出这一精辟的科学结论，发出了刻骨铭心的感叹。试看今日之域中，与先生有此同见者，竟有几人！我们看到，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文史哲已经受到忽视，甚至被排斥。在一些人看来，唯有科技才能创造财富，惟
？

有搞经济才能带来实惠。嘲弄文史哲，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不能不受到惩罚。请看，在经济改革中崛起的多少企业家纷纷“落马”，走向历史的反面。更有甚者贪污受贿聚敛财富，终于成为阶下囚。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训诫其兄弟子侄时说：财货乃身外之物，多藏无益。即便不义而富，能有不死之术而使自己永远享受的吗？太祖时代的大臣，活到现在的有几人？人的一生，如寄身子天地间这个大旅馆之中，何必为自己过多营谋？子孙如果贤能，则自会显达；子孙愚昧无知，你们即使留下很多产业又有什么用？根本的问题，惟建功立业可垂永久，这才是最宝贵的！

很可惜，一些人的识见连 300 多年前的一个满族皇帝都不如。如果那些“落马”的企业家们能够读读皇太极的这段话，并接受劝诫，也许就不会在金钱上栽斤头。他们的失败，各有具体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文化素养低下，思想品位庸劣，经不住成功的陶醉或各种货财或美色的诱惑，乃至愚昧无知，利令智昏。

以上所说，似乎扯远了。其实不然。我所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必须接受社会科学主要是文史哲的熏陶，学习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把自己熔铸成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品位的内外兼雅的高尚之人。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借助社会科学，促使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在当今改革、经济突飞猛进之时，尤其呼唤精神文明。如果以为经济

上去了，精神文明也就上去了，实为大错特错的愚昧之见。事实表明，经济建设固然不易，而建设精神文明，重铸民族文化的品格更难，绝不是像毁一座楼房另建一座新楼房那么容易，相反，这需要一代至几代人的不断探索，不断变革陈规陋习，不断摒弃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丑恶，才能形成一代民族的文化新风。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与出版，不仅仅提供文史哲方面的丰富知识，更重要的是，它着眼于改善和提高青年的文化素质。近年来，有关历史与文化的知识性的、学术性的书，有如铺天盖地而来。为青少年写的书，也是名目繁多，内容无所不及，多得数不胜数。不过，专为青少年写的历史与文化类丛书并不多见。青少年正是吸纳知识、为未来人生奠基的重要阶段。思想品德的修养，理想与志向的选择，世界观的确立，主要有赖于这个阶段的努力程度。一句话，人一生之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少年时期学习之成败。因此《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之出版，能给青少年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

这套丛书内容广泛，又相对集中。中国历史文化，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可以说，涵盖了中国自古至今的全部历史与全部文化。从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归纳为 30 个专题。比如，就文学艺术来说，已选了散文、诗、词、赋、民歌、戏曲、小说等；哲学则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两宋、清及晚清等几个重要时代的哲学；民

俗方面，已选了服饰、节日、嫁娶等；历史有历代改革、帝位之争、农民起义、英雄人物等。从《中国历史文化丛书》整体看，内容相当广泛；从个别看，又都是具体的，集中在一个问题，成一个中心。从纵的方面说，各书内容具有内在联系，勾勒出中国历史与文化演变的轨迹，构成了一个整体；从横的方面看，各个内容独自成书，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以此纵横交错，“组合”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个系列。当然，这不是惟一的系列，人们还可以从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中，重新选择，重新“组合”，只要选取准确，“组合”趋于合理，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同。本套丛书的“组合”基本合理，就在于这些内容基本反映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面貌，并且也适合青少年阅读，与他们的理解能力相适应。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去繁就简，简明扼要。如《诗渊歌海——中国历代诗》所言，中国诗歌向称发达，有数千年之积累，汗牛充栋，恰似汪洋大海，仅写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没有厚厚的几本书，是难以写尽全貌的。其它如《宫廷剑影——中国历代帝位之争》、《欢乐的日子——中国传统节日》等等，每个题目都很大，时间跨度长，内容更为繁富，绝非一本小书所能容纳的。为适应青少年读书方便，省时省力而收实效。我们采取“大题小作”的原则，把每项内容加以科学地浓缩，删繁取简，弃长用短，既要从客观上把握全局，又把局部具体化，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抓住精髓，做到少而精。

其次是，与此相适应，文字少，篇幅短，每本书不过七八万字，用时不多，就可以读完全书。现在写书，越写越长，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是不宜的。文字通俗化，适应青少年的识读能力，是本丛书的又一特点。具体说，原属深奥的道理，化为通俗讲解；原为难懂的古文，改用现代语言表述，力求读者读懂读通。所有这些，都是为青少年便于阅读和理解书中内容而设计的。

如何读这套书，不妨也说几句。读书，首先要读懂，读不懂等于没读。不易懂之处，不妨多读几遍，反复思考，也就懂了。如求教他人，也是一种简捷之法。古人强调读书务在“明理”。所说“理”，就是是非之理、做人之理，处人处事之理，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谓“明理”。《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给人以启迪和借鉴，是不言而喻的。读此书而不明理，也是白读！最后，读书全是为了应用。与“明理”相联系，能把书中得到的教益，求诸自身，化为实践，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中国历史文化丛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作者多，难免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未必完全一致；加之每本书涉及内容繁富，取舍不当之处在所不免，望读者批评教正。

李海亭
于南湖新村寓所
1998年2月25日

概　　说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抽象思维逐渐臻于高度发达，哲学界群星灿烂，影响深远。主要思想为佛学与反佛学。

隋唐的佛教哲学是一种思辩和烦琐的经院哲学。它的理论渊源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唯心主义：一是般若空宗，宣扬“一切皆空”、“心境俱无”，认为心识和外在客观世界都是虚假的；一是唯识有宗，宣扬“心有境无”，认为外在客观世界是虚假的，心是真实的。这两派的共同点都是宣扬物质世界的虚幻、神的世界的真实，让人们追求虚幻的彼岸，放弃对现实世界的斗争。这两派佛教唯心主义体系相互影响，成为隋唐佛教唯心主义的理论根据。

佛教在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并进而形成许多宗派。这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第一，隋唐的政治统一，为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加强了各地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南北僧人的交流，使南北佛教得以相互融合。隋唐各派佛教虽然自立门户，但都在吸收其他教派的基础上建立起庞杂的思想体系。第二，隋唐统治者提倡支持佛教，为佛教的发

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南朝末年和隋代末年的农民起义，使统治者现实地看到，为了防止农民起义的再起，麻醉人民的斗志，必须利用佛教界有声望和影响的人物来为自身的统治服务，即必须利用宗教信仰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唐太宗虽口称“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但仍承认佛教是不可缺少的“有国之常经”，并建寺、营斋、礼敬玄奘、亲自撰写《圣教序》等，不遗余力。到武周一代，新崛起的华严宗、禅宗更得到朝廷尊宠；武则天自封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用佛教金轮的灵光圈来装饰自己。第三，唐代寺院经济的空前发达，为佛教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隋唐时期，寺院经济急速发展，形成了除拥有大量耕田以外，还拥有果园、竹林、手工作坊、店铺等的庄园经济。佛寺几乎垄断了社会财富，“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唐武宗会昌五年时，全国佛寺达 4600 所，兰若四万所，僧尼 26 万人，奴婢 15 万人，拥有“膏腴上田数千万顷”。当时山东有一个寺院，就有“庄园十五所”之多。繁兴的寺院经济，为隋唐佛教展开活动、创立宗教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由于以上原因，佛教内部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宗派，其中势力较大、影响较广的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唯识宗等。净土宗、律宗、密宗等，主要宣传宗教实践，缺乏理论创造。它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一向不占重要地位，只有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是最富有宗教理论色彩的，并对

尔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华严宗和禅宗，力图会通佛教各宗的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且具有各自独特的哲学理论形态，成为中国化佛教哲学的典型。禅宗虽然有宗教哲学理论，但教义简易，没有烦琐的理论说教，更易于为普通老百姓接受。禅宗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有很深的影响。

由于佛教盛行，并与世俗地主阶级争夺土地和劳动力，加深了官僚贵族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的矛盾。加之寺院免税免役，造成财政收入困难、剥削面窄，因此，唐代出现了排佛议论。唐初的博毅及后来的狄仁杰等，都曾反对过佛教。中唐时期，韩愈及其学生李翱继起反对佛老，他们宣扬儒家的道统，在政治、伦理、世界观和人性论方面，树立儒家的道统。但是，韩李虽然反对佛老，却不反对传统的迷信。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是中小地主阶级思想家的保守派。他们只是用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所以他们对佛老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唐中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中小地主阶级的激进派柳宗元和刘禹锡，坚持和发展了王充以来的元气自然论，对传统迷信进行了有利的批判。刘禹锡还对迷信思想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贡献，但和当时的唯心主义阵容相比，还嫌薄弱。所以，唯物主义要和唯心主义相抗衡，

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时期，因为隋唐时期哲学的特点是宗教神学的猖獗和唯心主义占绝对优势。

目 录

前言	1
概说	1
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宗派	1
1. 用“心”造出三千法界	2
2. 世界是空、是假、还是中	5
3. 既要修心又要修行	7
4. 万物有佛性	8
二、迷宫式的理论	12
1. 迂回曲折论世界	12
2. 不偏不倚认识世界	15
三、妇孺皆知的佛圣	18
1. 一切皆空	20
2. 一种颠倒了的认识论	22
3. 为“识生万物”找一个根据	25
4. 如此看世界	27
5. 如此成佛很容易	29
6. “识生万物”的逻辑证明	31
四、一副佛经和阶级矛盾的调合剂	33
1. 色与空之辨	35
2. 理和事之领悟	36

3. 十条深远玄妙的道理之刻画	37
4. 六种相状之融合	40
5. 四种法界之概括	42
6. 圆教理论之归宿	42
五、不识文字也能成佛	44
1. 顿悟就能成佛	45
2. 心动万物才动	49
3. 不修行就是修行	51
4. 在惊世与愚人中找到了位置	54
六、重振孔孟儒学之雄风	58
1. 重振儒学建道统	59
2. 为“我”就要排“它”	64
3. 为“道统”寻根找据	68
4. 冥冥中岂有天意	71
七、再扬中庸之道	74
1. 一个自称孟轲学说的继承者	75
2. 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学说	76
3. 不思不想不动心	78
八、一位奉佛的唯物主义者	80
1. 世界生于元气	81
2. 天不能赏善罚恶	85
3. “势”不可违	89
4. 忧国忧民 开出治世良方	94
5. 思想领域的中西合璧	97
九、对“天人关系”的再度析辨	99
1. 谈天说地论规律	100

2. 一个令宗教神学不能接受的命题	104
3. 人道明则信人 人道昧则信天	107
4. 不信天而信佛	110

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宗派

天台宗起源于北齐、南陈，盛行于唐代，中唐以后趋向衰落。因其实际创始人常住浙江天台而得名，它以弘传《法华经》为宗旨，所以又称之为“法华宗”。天台宗是我国历史上形成最早的佛教宗派。其传法体系为：龙树、慧文、慧思、智𫖮、灌顶、智威、玄朗、湛然。龙树是印度人，又比慧文早卒二三百年，他与慧文并无实际的授受关系，只是因为慧文受龙树思想影响颇大，又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思想体系，才尊龙树为始祖。慧文、慧思的思想观点对后世天台宗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们在世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组织系统的宗派，所以说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智𫖮。

智𫖮（530—597），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迁到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父亲陈起祖在梁元帝时任散骑常侍，封益国公。后梁元帝兵败被杀，一家人颠沛流离。不久智𫖮父母又双双辞世。智𫖮于18岁时投湘州果愿寺，从法绪和尚出家受了戒律，以后又北上受教于慧旷禅师。23岁时，到光州大苏山，向慧思禅师学习“一心三观”的教义。南朝陈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建草庵。曾在天台山讲经几十年，故称